

# 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中的學習紀錄 之初探\*

胡佳君\*\*

## 一、前言

本文之研究動機與背景，係來自於博物館關注與推動大眾史料蒐整與研究的立場，藉由民間出土的常民生活中的教育史料文物為基礎進行觀察與初步探討。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所蒐藏的文物，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每年受理由民眾所捐贈出的常民物件。這些文物的特殊之處為來自於真實的常民使用脈絡中，保存和紀錄著使用者的記憶，是來自於生活現場中的歷史材料。本文擬透過臺史博經由臺南新化文史工作者康文榮先生引介、於 2017 年底獲臺南新化柯瑞吉先生欲捐贈家族教育文書案（以下簡稱「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為中心，在此批史料與可觀照之研究課題中，透過學生筆記的學習

\* 本文感謝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上學去：臺灣近代教育特展」策展團隊（前副館長謝仕淵副教授、臺史博張瀛之研究助理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許佩賢教授等），在策展過程中以「近代教育與人」所進行的有關議題討論，以及臺南新化地方文史工作者康文榮先生協助柯家教育文書的居中聯繫，林佳蓉小姐協助館內搬運文物事宜，林子媛小姐於 2017 至 2018 年間進行第一階段的文物評估（包含文物彙整、柯家資料調查研究與文物翻攝），最後並誠摯感謝柯瑞吉先生與其家族，將這批文物保存並願意捐贈給博物館促進歷史公共化。本文部分內容曾由筆者以〈臺灣學生的近代教育經驗——以新化柯家教育文書中的學習紀錄為例〉為題發表於「上學去——近代教育與臺灣社會」臺灣教育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01/19），受當時主持評論人陳文松副教授及其他與會教授先進們諸多指證，以及於投稿本刊時受三位匿名審查者所提供的寶貴意見，申致謝忱。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專案助理

紀錄與相關文件的脈絡、載錄之內容，可提供我們理解自日治晚期至戰後初期，特別是戰後初期臺灣人面對政權轉換之下的學習情況與適應，以及紀錄所感受的學習經驗。

在近代教育史的研究範疇中，前人已有許多關於制度、教科內容、政治政策與社會關係等研究方向之的探討與分析。<sup>1</sup> 然除此之外，在整個近代教育體制中還有更多與公眾的生活經驗更直接相關的構成，針對具體的「人、事、物」所開展的近代教育史研究，也有越來越多的討論，例如在運行於各地的教育機構（學校），其校園生活行事與地方發展之間的關係；以及在這中所涉及的不同群體、人物，有教師、家長、學生等等在這制度扮演不同的角色和各有其觀照與經驗，分別反映不同立場對於教育的觀點；更有在教育現場所使用的文書資料、物件、教育用品等，在物質文化方面的使用脈絡。

相關研究成果可以大致區分為幾種類型，一為人物或群體方面，<sup>2</sup> 二為以校史研究或藉由學校公文書檔案內的紀錄為主進行分析，<sup>3</sup> 三為探討校園生活中的物質文化；<sup>4</sup> 四為學生的校園生活經驗，<sup>5</sup> 這些教育史研究的走向，不僅

<sup>1</sup> 關於 1990 年代以後臺灣教育史研究的動向與回顧，可見吳文星〈近十年來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研究之動向（1991-2000）〉，《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9 期（2001.6，臺北），頁 221-238；許佩賢，〈2009 年教育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0/12/16-17）等歷年教育史研究回顧之文章。

<sup>2</sup> 如許佩賢，〈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地方青年教師的「發達之路」及其限制——以張式毅的軌跡為中心〉，《新史學》24 卷 3 期（2013.9，臺北），頁 135-183；蔡錦堂，〈新竹中學校出身的臺北高等學校生初探〉，《師大臺灣史學報》10 期（2017.12，臺北），頁 123-150；陳文松，〈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等。

<sup>3</sup> 如蔡錦堂主編，《「臺北高等學校創立 9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4）；謝仕淵，〈二戰空襲下的學校行事與學生疏開——以臺南州地區港國民學校與媽祖廟國民學校為例〉，「近代東亞教育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教育史研究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2015/11/13-14）等。

<sup>4</sup> 如彭威翔，〈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制服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等。

<sup>5</sup> 吳文星，〈日治時期中學生的亞洲認識——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修學旅行」為中心〉，「近代東亞教育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教育

是梳理與分析具體的個案，挖掘與觀照不同層次中臺灣人的近代教育經驗，也提供社會大眾了解與自身視角相關的歷史內容。

本文初探之史料「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其透過捐贈予博物館而公開，在前述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開展上，提供我們了解在一個具體的臺灣地方社會中，一個家庭成員分別在近代教育制度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與經驗，以及近代教育運作於地方上的實況，以下概述與介紹此批史料與相關脈絡。

## 二、臺南新化柯家教師家庭與其私人教育文書蒐藏

「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所涵蓋時間自日治中期至戰後初期（大部分史料時間約處於 1920 年代至 1950 年代），以個人生命歷程與家族經驗的近代教育史為主，種類包含教師教案、學生學習筆記、試卷甚至於學校公文書、教科書與個人文件等，總數逾三千件，是數量、種類與歷時性相當可觀之民間教育文書蒐藏。此批史料至今由臺史博持續進行文物評估整理，目前已完成一千餘件評估入藏。觀其所涉及之人員與文物類型，分別說明如下：

### （一）新化柯瑞吉先生與其所屬之教師家庭

捐贈者柯瑞吉先生來自於臺南市新化區的教師家庭，日治時期他的父母親皆於新化擔任學校教師，父親柯天送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畢業後回到臺南，自 1921 年分別任職於學甲公學校（今學甲國小）、新化公學校（今新化國小）、<sup>6</sup> 左鎮公學校岡子林分教場（今左鎮國小）、新化公學校虎

史研究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2015/11/13-14）；林政君，〈日治時期臺灣女學生的登山活動——以攀登「新高山」為例〉，《人文社會學報》3期（2004.12，臺北），頁 199-224；鄭麗玲，《躍動的青春：日治臺灣的學生生活》（臺北：蔚藍文化，2015）。

<sup>6</sup> 新化國小於日治時期之校史沿革為，1898 年設立臺南國語傳習所大穆降分教場；1912 年為大穆降公學校；1901 年為大目降公學校；1922 年為新化公學校；1941 年為新化北國民學校。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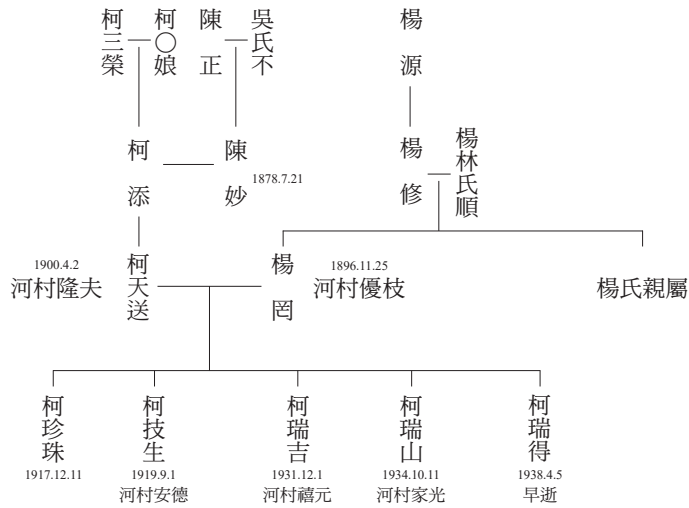


圖1 新化柯瑞吉與其家族成員關係圖

彙整資料與製圖：林子媛。

頭埤分教場（今口埤國小）、新化初級女子職業學校等；母親楊罔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技藝科畢業（今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畢業後曾於 1920 年起任職大目降公學校（今新化國小），<sup>7</sup> 為新化第一位臺灣女性教師，於與柯天送結婚後之 1929 年離職。<sup>8</sup> 在皇民化運動時期，柯家獲得「國語常用家庭」牌，家族成員也同時於 1941 年改日本姓氏，柯天送、楊罔分別成為河村隆夫、河村優枝，待 1945 年戰爭結束後改回原姓氏。<sup>9</sup> 柯天送更於戰後任職於新化初級中學（今新化國中）公民科教師，直至 1965 年退休。

家族史再往上溯及，祖父柯添在清朝統治晚期為私塾老師。柯瑞吉本人也

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2019/2/28；新化國小網站之校史簡介，<http://163.26.179.8/~wpmu05/wpmu/shintroduce/>，2019/2/28。

<sup>7</sup> 同註 3。

<sup>8</sup> 關於楊罔的研究，可見北村嘉惠，〈試探臺南新化楊罔之生命歷程：20 世紀前期臺灣女性的就學與教育經歷〉，《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17 期（2019.5，臺南），頁 7-32。

<sup>9</sup> 依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中的紀錄，其父柯天送於 1941 年起所被記載之姓名為「河村隆夫」，故推斷柯家在 1941 年後改為日本姓名。依據新化柯家文書中所留存的個人文件中，有一份於戰後 1945 年柯家提請戶籍更改姓氏申請書中所記錄，柯家全家於該年申請由河村氏改回原姓名。

從事教職，其兄長柯枝生也於戰後任職過教職。爬梳其家族的近代教育經驗，不僅有學生、家長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家庭成員中有許多擔任教師，<sup>10</sup> 因此新化柯家教育文書與其捐贈予博物館後，將通過博物館進行公共化，有助於開展後續更多元面向的教育史研究。但同時也需留意家庭成員的受教育程度，作為地方知識份子家庭，其所指涉的臺灣人近代教育經驗，是相對來說求學條件與能力（包含經濟與受教基礎等）較好的臺灣人。

本文將著重於透過此案文書中的學習紀錄進行初探，以下說明在此案文物時間中屬於「學生」的柯瑞吉與胞弟柯瑞山的個人生平與求學經驗：

本批文物捐贈者柯瑞吉，於 1931 年在臺南州臺南州新化郡（今臺南市新化區）出生，曾就讀新化公學校虎頭埤分教場（今口埤國小）、新化公學校（今新化國小）、<sup>11</sup> 臺南州立臺南工業學校（今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建築科，後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因戰況緊張與空襲密集，學校停學疏散。1941 年曾改名為河村禧元，1945 年改回姓名柯瑞吉。依柯瑞吉的畢業證書與就學時週記簿上的時間紀錄，他在 1947 年九月開始重回學校上課，原就讀學校改稱為臺灣省立臺南工業職業學校（今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950 年畢業後，曾考上臺灣鐵路局運務人員，但因被分發到當時的基隆市八堵車站運務段，不願離家太遠而未任職。適逢當時臺南縣左鎮鄉岡林國民學校在徵代理教員，故前往應聘，遂開啟了他與父親柯天送相同的教師生涯。柯瑞吉在 1951 年獲國民學校初級級任教員試驗檢定及格，1953 年開始任教於臺南縣新化國民學校（後改稱新化國小）至 1990 年代退休。<sup>12</sup>

柯瑞山，於 1934 年出生於臺南州臺南州新化郡（今臺南市新化區），日本姓名為河村家光。日治時曾就讀新化公學校（今臺南市新化國小），戰後先後就讀新化初級中學（今新化國中）、臺灣省立臺南工業職業學校（今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科。

<sup>10</sup> 具新化地方文史工作者康文榮先生口述，楊岡女士的娘家成員中也有許多位於新化擔任教職。

<sup>11</sup> 同註 3。

<sup>12</sup> 退休時間為經柯瑞吉口述大概，尚須進一步參閱相關文件確認。

## (二) 「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蒐藏之文物類型

據與柯瑞吉口述訪談時提到，這批文物最原初的蒐藏者是其父柯天送，將家族成員的學習成長記錄路相關物件保存，除教科書、筆記、教案與證書等紙質文物外，其中還有一件柯瑞吉兄長柯枝生的劍道服；以及因目前未能探究之動機，將所任職學校內的文書資料也一併帶回家收存，包含 1946 年至 1947 年間新化女子初級職業學校與新化初級中學合併案相關公文書。此批文書史料中，以柯天送擔任教師時所留下的教師資料（包含教學筆記、學校文書等），與柯瑞吉求學時的學習紀錄為最大宗。

據柯瑞吉表示，原本所保存的文物量更多，但因為時間關係，受到自然環境與人為影響，於長時間下文物發霉、蟲害、破損或被偷竊，或是戰後初期因當時社會政治因素考量而放棄一些日治時期的物件（如柯天送於日治任職學校教師而佩的文官禮刀因二二八時期繳出），僅留下目前所見之文書文物，博物館受捐贈的文書文物詳細可參考下表：

表1 「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蒐藏類型

類型	細項
家族成員個人文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 證件與證明類：學歷證明或證書、履歷書，以柯天送、柯瑞吉為主，另有劉啓佑（柯天送同母異父之弟）之獎狀與證書，以及柯天送申請教員無試驗檢定申請資料。</li><li>● 生活文件：法律書狀、稅務資料、股票</li><li>● 書信</li></ul>
學校文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 學校行政文件，分為日治時期、戰後。</li><li>● 學校行事曆，以戰後為主。</li><li>● 教職員及學生假單，以戰後為主。</li><li>● 教職員評鑑資料，以戰後為主。</li><li>● 儀器目錄與購買書，以戰後為主。</li><li>● 空白文書表格，以戰後為主。</li></ul>



類型	細項
書籍刊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教科書：包含課本、習作。</li> <li>● 考試用書：參考書、題本、試卷等。</li> <li>● 大眾閱讀書籍：線裝小說、百科學書等。</li> <li>● 思想相關書籍</li> <li>● 教學研究相關書籍</li> <li>● 雜誌刊物：包含學生雜誌、讀者文摘等。</li> <li>● 校友會誌、校刊</li> </ul> 註：以上類型可依時間在個別細分為日治、戰後。
手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筆記簿、作業簿：柯天送、柯瑞吉、柯瑞山和柯枝生。</li> <li>● 週記簿、作文簿：柯瑞吉、柯瑞山。</li> <li>● 教學筆記、教案：柯天送。</li> </ul>
實體物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日治時期家門牌與附盒</li> <li>● 日治時期國語家庭牌</li> <li>● 楊岡結婚禮服</li> <li>● 柯枝生劍道服</li> </ul>
畫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柯家家族成員的圖畫</li> <li>● 掛軸畫</li> <li>● 學校學生的美術畫作</li> </ul>
地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颱風動態圖、新竹市地圖、中國大地圖</li> </ul>
報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剪報</li> <li>● 整卷報紙</li> </ul>
歌譜、樂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音程教本</li> <li>● 柯家抄錄的歌譜</li> <li>● 廣播教本</li> </ul>

資料來源：林子媛彙整製表，由本文重新調整表格與補充。

接著，更進一步介紹新化柯家教育文書中與學生學習與校園生活相關的紀錄，以柯瑞吉本人有關的資料為大宗，與其胞弟柯瑞山之部分留存之文書，包含筆記簿、考卷和週記簿等學生的學習記錄。此二人在學校求學階段，正好適逢於 1930 至 1950 年代、日治晚期至戰後初期之間，所受教育的內容也跟著受到政權交替而有所改變，特別著墨於可供我們理解戰後初期臺灣學生在學習適應上的實況。

有別於教科書中由官方（教科書編寫者）所論述的公開知識體系，欲針對學生在近代教育中的角色和學習經驗實況作探討，藉由學生經由理解與吸收所受之教育與知識內容後，以個人的經驗與觀點所寫下的筆記內容，更能呈現出對於學習的真實反應與學習情況。在整理新化柯家教育文書時，閱讀柯瑞吉與柯瑞山的學習紀錄，包含其書寫的內容、在筆記上的註解、塗鴉等等，是非常有趣味的一件事情，並陸續藉由訪談柯瑞吉先生的求學回憶，將文物之使用脈絡與個人生命經驗漸次拼湊與想像出當時候學生的校園生活，不僅是可以理解個人的學習情況，更進一步可與所在之學校、地區，甚至與當時候的臺灣社會現況進行連結。

本文所介紹之相關文書類，除以下各別討論之各科筆記外，擬從戰後初期 1947 年至 1949 年間，柯瑞吉就讀當時臺南高級工業學校、柯瑞山就讀當時臺南縣立新化初級中學時所留下的週記簿所記錄的學習心得，進行觀察。目前柯瑞吉先生欲捐贈予臺史博的週記簿共有 4 本，詳表 2，總計有 96 篇（週）的紀錄。

表2 「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中所藏戰後學生週記簿

項次	姓名	文件名稱	就讀年級	載錄時間 (西元年)	篇數
1	柯瑞吉	臺南高級工業學校生活週記簿	高級部建築科一年級	1947.09.22- 1948.01.20	17
2	柯瑞吉	臺南高級工業學校生活週記簿	高級部建築科二年級	1949.02.21- 1949.06.04	15
3	柯瑞山	臺南縣立新化初級中學週記簿	第一學年 A 班	1947.12.01- 1948.06.26	27
4	柯瑞山	臺南縣立新化初級中學週記簿	第二學年愛班	1948.09.10- 1949.06.26	37

不過面對學習筆記這類材料仍須留意，除卻學習筆記可能是個人私下抄寫與學習之用外，學校生活週記簿、以及本文未介紹到的作文簿等此類學校作業會經由師長批閱，一方面可以看到學生書寫思考與教師批閱評論的互動、意見之外，然另一方面因其公開被檢視的特性，其書寫內容會受到一定形制的規範，以及學生有可能會基於此考量寫出符合體制的內容，在解讀時須多加留意。





圖2 「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中所藏戰後學生週記簿

說明：由左至右分別為《柯瑞吉臺南高級工業學校生活週記簿高級部建築科一年級》、《柯瑞吉臺南高級工業學校生活週記簿高級部建築科二年級》、《柯瑞山臺南縣立新化初級中學週記簿第二學年愛班》、《柯瑞山臺南縣立新化初級中學週記簿第一學年A班》（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文物評估案）。

### 三、語言的學習與適應

1945年戰爭結束後，臺灣人面對新的統治者，首先面對倒在生活中影響最大的語言溝通問題。「語言」是滲透在日常生活中，作為統治技術、學習知識與文化表達的工具，差異不僅在語言有別，更是背後所傳承的一套文化與思考的脈絡。不論是戰前日本時期或者是戰後，不同政權藉由「國語」的推行，讓全體國民使用國家制定的同一種的語言與文體，進行口說、閱讀和書寫，來達成國民的統一性。關於日治時期到戰後的語言政策，不論在其內容的分析，或藉由官方語言作為國家政府統治的方法以及國民認同的塑造，前人已有諸多研究成果。<sup>13</sup> 關於新化柯家教育文書案中的柯家家庭成員於戰後的語言適應情況，以下透過文書紀錄與口述訪談分析之。

首先，是戰後初期的地方學校內執行語言政策的情況，可以分別自柯瑞吉

<sup>13</sup> 如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2006）；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2017）；蕭阿勤，《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2012）等。

在 1947 年 9 月的兩篇學校生活週記上（圖 3、4），可以看到當時後學校宣達的事項中，連續兩週寫明「不說日本語」。又、柯瑞山的週記簿於 1947 年 09 月 12 日至 18 日的紀錄（圖 5）中也提到：「徐校長訓示我們對『國語』要格外注意學習。不然將來外省的老師來多了，教學很影響（原字：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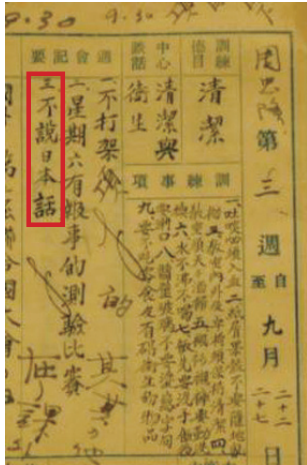


圖3 1947年9月22日至27日柯瑞吉週記簿

資料來源：柯瑞吉，《柯瑞吉臺南高級工業學校生活週記簿高級部建築科一年級》（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文物評估案，1947-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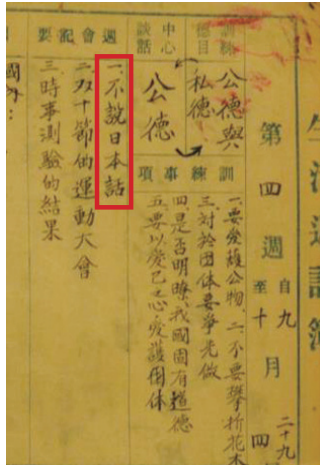


圖4 1947年9月29日至10月4日柯瑞吉週記簿

資料來源：同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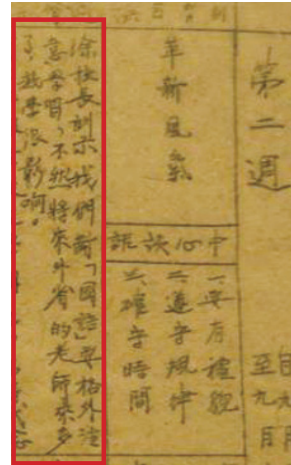


圖5 1948年9月12日至18日柯瑞山週記簿

資料來源：柯瑞山，《柯瑞山臺南縣立新化初級中學週記簿第二學年愛班》（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文物評估案，1948-1949）。筆者按：此本週記簿中9月週數日期有重複出現，需再進一步確認考證年份。

戰後 1946 年起，國民政府規定各級學校一律教授國語（北京話）與白話文，並由官方設置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同時開始禁用日語。<sup>14</sup> 此三篇週記除了載明現今我們已知戰後的日語禁用，同時也傳達當時後學校的師資情況，由此推測「外省籍」師資可能還未有太多人進入當地學校、但也預備進入一批「外省籍」師資；以及臺灣學生尚在學習中文的階段，以中文進行教學可能的影響。關於師資的部分，後續研究可進一步對柯瑞山就讀的今新化國中進行教職員資料調查與應證。

<sup>14</sup>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 35-58。

接著，針對個人的學習上，更可以從學習筆記中更清楚觀察到語言的學習與適應。在柯瑞吉戰後一本由三種語言混雜書寫交錯而成的英語科學習筆記本（圖 6）中，內容除了記錄英文的句型和單字之外，同時還有中文與日文所書寫的解釋做對照。從這份筆記中可以了解戰後的臺灣學生在，在學習英語的同時，在也必須要學習與使用新的國語（北京話）。在還未完全適應新國語的情況下，使用相對較為熟悉、但已不是國語的日語來相互對照。有趣的是，從這本三語頻道的學習筆記上來看，究竟誰才是外語呢？耐人尋味。類似的現象，在另一份化學筆記（圖 7）中，亦可以發現柯瑞吉雖以中文進行主要文字的書寫，但有時仍搭配使用日文做個人備註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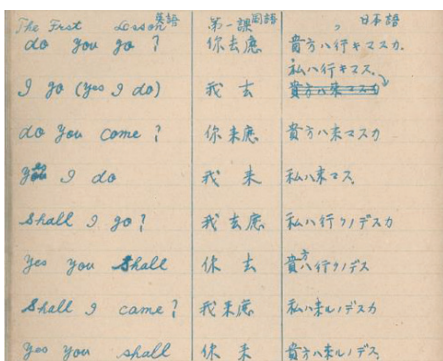


圖6 戰後約 1947 至 1950 年間柯瑞吉英語筆記簿

資料來源：柯瑞吉，《英文學習筆記》（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文物評估案，推測為 1940-1949 年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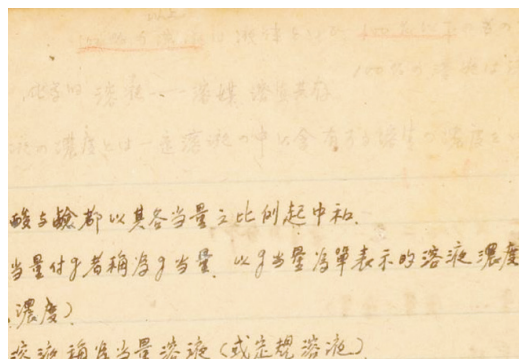


圖7 戰後約 1947 至 1950 年間柯瑞吉的化學筆記簿

資料來源：柯瑞吉，《化學科筆記本》（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文物評估案，推測為 1940-1949 年間）。

透過口述訪談中詢問柯瑞吉在求學階段的學習狀況，他表示在日治時期唸書的時候沒有讀過漢文，但從小喜愛閱讀課外讀物，這些課外讀物亦是吸收近代知識的管道之一，其內容多半以漢字行文印刷，有助於他在識字閱讀能力上有很大的幫助。在戰後學習中文上，多半是日文閱讀漢字的方式來加快理解。他提到：「一個頭兩個大，真的很困難啊，只好死背，用日文標註來讀、來練習發音。但也容易會發生錯誤，像有個同學就發生把『而且』的『且』記錯，『且』

在日文的訓讀音『katsu』，音同另一個日文字『勝（katsu）』，就把兩個字搞錯了。」他特別提及這時候喜愛閱讀家中一套《日本家庭大百科》，此系列書籍內容豐富、涵蓋知識面向廣泛、圖文並茂，他在其中學習許多的知識與趣味，言談之間再三提及對於其中一頁繪有鳥類圖鑑的彩色插畫之印象並加以描述。而筆者在後續進行此案文物整理時發現這本百科全書中的這一頁，印象深刻。

語言適應的問題，不僅只是書寫的語言有別，更包含用字遣詞、語法邏輯也是戰後臺灣人必須面對的問題。例如，柯瑞山的週記簿在 1948 年 9 月至 10 月的學校學級要聞一欄中，原寫到：「舉行父兄會在星期日」（圖 8）、「柯老師<sup>15</sup> 說父兄會費快要納」（圖 9），柯瑞吉 1949 年 3 月 14 日至 19 日這週的週記上寫道「……我在這週記了很少之英單語，和解了少少之解析幾何之宿題」（圖 10）。其中，「父兄會（ふけいかい）」、<sup>16</sup>「宿題（しゅく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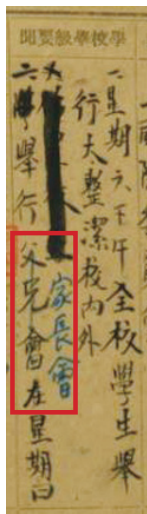


圖8 1948年9月26日至10月3日柯瑞山週記簿

資料來源：同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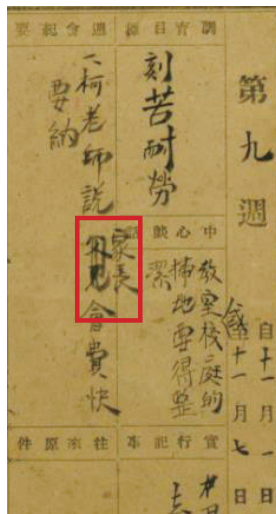


圖9 1948年11月1日至7日柯瑞山週記簿

資料來源：同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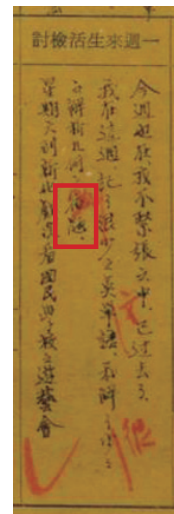


圖10 1949年3月14日至19日柯瑞吉週記簿

資料來源：柯瑞吉，《柯瑞吉臺南高級工業學校生活週記簿高級部建築科二年級》（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文物評估案，1949）。

<sup>15</sup> 此柯老師應為其父柯天送，於戰後任職臺南縣新化初級中學，並曾分別兼任學校不同行政。

<sup>16</sup> 今日文「保護者會（ほごしゃかい）」之舊稱，性質等同於今臺灣的學校家長會。



い)」<sup>17</sup>一詞為日文的用法，各自分別被劃老師掉批改為「家長會」、「訓題」（按：推測應為訓練題之意）。此批材料裡的相關紀錄，提供我們了解當時人們學習中文時所會面對到的問題。

戰後臺灣人適應語言轉換的問題，比起尚在接受教育的學生，受影響更深的是原先在日本治時期受教育長大、工作多年的成年人，在人生的青壯年（或中年）重新面對一個全新的生存環境。例如在學校的場域中，原在日本時代就開始教書的臺籍教師，在戰後不僅是學習新的語言，更要面對與學習新的文化與教學內容。據柯瑞吉先生口述其父親柯天送於戰後任教選擇擔任公民科教師的原因，其中一個因素為無法在短時間學習戰後教育現場所需的知識，如語言、歷史、地理等科目跟著政權轉換而更動另一套國家觀點，所涉及的內容需要花費精力與時間改變原有的認知，公民科的內容相較之下以三民主義或倫理價值等內容為主，較容易備課。<sup>18</sup> 在新化柯家教育文書中有一部分的書籍，是戰後柯家在學習「新的國語」（北京話）所收到或購買的教材，例如由國語普遍促進會發行的《國語發音補充教材》，內文除了有中文與注音外，並附上日文做對照，輔助臺灣人學習。柯瑞吉的爸爸柯天送，於戰後任教於新化初中，柯瑞吉的兒子柯敦仁口述訪談時回憶道，自己的國中老師剛好是柯天送的學生，跟他提過柯天送當年在教書時因為語言而發生的趣事：「我阿公以前國、臺語混在一起，看到小朋友在拿棍子打芒果，就喊：『你為什麼拿地上的拐子（kuái-tzu），打樹上的樣子（suāinn-tzu）』。原先臺語的「拐仔（kuái-á）」、「樣子（suāinn-á）」，變成直接用國語發音，形成語句混亂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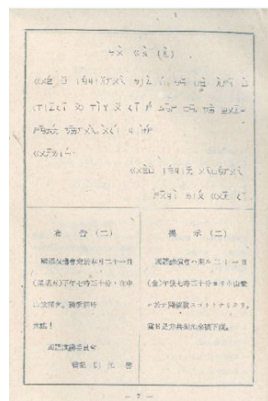


圖11 國語普遍促進會發行的《國語發音補充教材》

<sup>17</sup> 家庭作業之意。

<sup>18</sup> 關於柯天送之研究，可見謝仕淵，〈收藏／不藏：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的收藏史解讀〉，《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17期（2019.5，臺南），頁59-78。

#### 四、學生的學習心得與紀錄

關於戰後初期臺灣學生的校園生活與上學心得方面，可以透過學校週記簿一窺而知。或許是週記中需要寫生活檢討與感想，在柯瑞吉和柯瑞山的週記簿中時常出現記錄自我學習情況，並且時常表達對學習和考試的憂慮。例如兩人都有在 1947 至 1948 年這一學年度的這份週記簿中，柯瑞山寫道「對於體育方面要多多練習」（圖 12）、「對於英文要多多複習」（圖 13），柯瑞吉亦寫道「英語方面要好好的讀」（圖 14）、「聽月考很恐怕（按：應指恐怖、可怕）」（圖 15）。

就週記中的紀錄推測其學習與適應的狀況，有兩個可能：一是單純與直覺紀錄生活，後期逐漸被師長要求增加書寫的內容（不排除這個可能）；另一是對於新國語（中文）的掌握還不是很純熟，因此在此階段會反覆出現雷同的句式，慢慢練習與調整語言表達。

關於後者的推測，更進一步可以從兩人在下一學年 1948 年至 1949 年這一學年度的週記簿中，觀察到兩人在語言表達的進步。例如柯瑞山寫到「這週的訓育目標是鍛鍊体魄，可是我對運動方面還不大努力，所以我以後要更加努力」（圖 16）、「這週我對代數科很熱心，這樣的好處我應該繼續下去」（圖 17），雖然仍有反覆出現類同的句式，不過語句的長度與用字有所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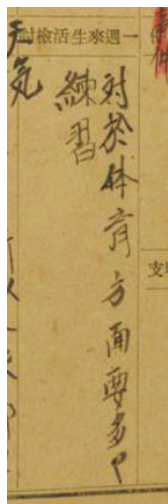


圖12 1948年2月25日至28日柯瑞山週記簿

資料來源：柯瑞山，《柯瑞山臺南縣立新化初級中學週記簿第一學年A班》（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文物評估案，1947-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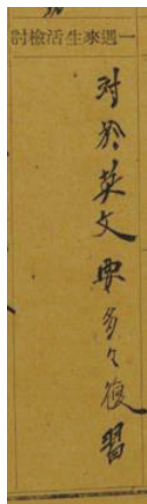


圖13 1948年3月8日至13日柯瑞山週記簿

資料來源：同圖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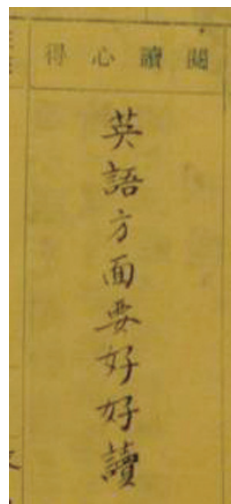


圖14 1947年9月29日至10月4日柯瑞吉週記簿

資料來源：同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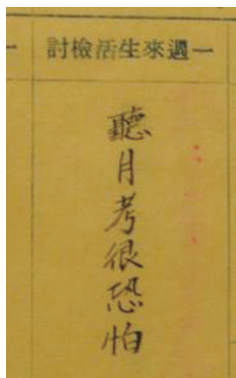


圖15 1947年10月13日至18日柯瑞吉週記簿

資料來源：同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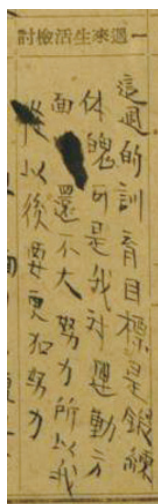


圖16 1948年10月18日至24日柯瑞山週記簿

資料來源：同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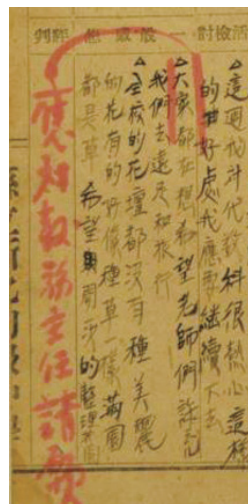


圖17 1949年4月18日至24日柯瑞山週記簿

資料來源：同圖5。

柯瑞吉也將對於各科的學習更詳實寫下心得，例如針對課程教材內容，他寫道「國文的虬髯客傳感到很有趣味，像讀小說一樣」（圖 18）、「國文課中之絕筆書<sup>19</sup> 感到了很容易，且我要尊敬這作者之思想（是革命黨員）。『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圖 19）；或是連續幾週的紀錄中，寫到關於解析幾何這一科目的學習狀況：「解析幾何的雙曲線之處不太明白」（圖 17）、「解析幾何的月考在小小的地方失敗，而使一半都不對了，感覺很可惜，我從此以後要好好的讀解析幾何，而補此月<sup>20</sup> 之失敗」（圖 20）、「解析幾何的雙曲線努力的研究，結果能明白了」（圖 21）。

以柯瑞吉為例，在其 1947 至 1950 年之間所寫下的週記與學習筆記可以發現，他對於中文的書寫與表達適應上進步地很快，從一開始的字跡還在調整、詞彙單一與句式情況，到逐漸慢慢增加字彙、內容、句式的長度，字跡也越來越工整與精細。

除此之外，學校週記簿因其格式欄位與書寫重點各校略為相似，以柯瑞吉與柯瑞山分別就讀的兩個學校的週記本格式為例，大致有以下幾個共同填寫欄位，包含國內外大事紀要、週會紀要、學校學級記事，個人生活檢討與心得等，後續進一步研究，可透過這些共同欄位之內容進行分析，包含了解當時學校的行事、宣達事項等基層教育的運作紀錄和發展；或是藉由其所記錄的國內外大事紀要與生活相關紀錄，提供理解戰後初期從國家到地方，乃至於個人所處之臺灣社會，例如在四本週記中兩位學生分別記錄了零用錢收支情形與消費購買力，可供我們進一步探討分析戰後初期物價變化等。

<sup>19</sup> 據其摘錄之文句，推測應為林覺民（1887-1911）的〈與妻訣別書〉。

<sup>20</sup> 此字無法清楚辨認，推測為「月」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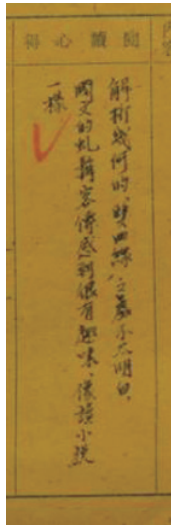


圖18 1949年3月21日至26日  
柯瑞吉週記簿

資料來源：同圖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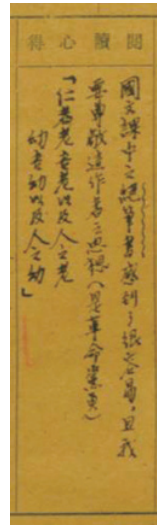


圖19 1949年3月7日至12日  
柯瑞吉週記簿

資料來源：同圖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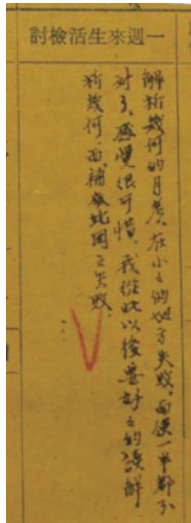


圖20 1949年3月28日至4月1日  
柯瑞吉週記簿

資料來源：同圖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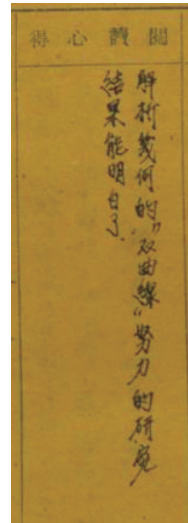


圖21 1949年4月4日至9日  
柯瑞吉週記簿

資料來源：同圖10。

## 五、小結

綜上對於新化柯家教育文書中的學習紀錄，梳理與說明其背景脈絡，擇以學生的筆記本與週記簿為主，藉由「語言的學習與適應」、「學生的學習心得與紀錄」兩個議題進行文物觀察與說明。

在語言的學習與適應上，我們從前人先進的諸多研究中，原已知戰後臺灣社會面臨到從國語到國語的轉化過程與探究分析，新化柯家教育文書中的學習紀錄，提供一個在基層、乃至於一個地方上庶民的真實經驗，語言的學習與適應對於他（他們）的日常生活與學習的影響。再者，此批材料中的學校生活週記簿，是一個較少接觸到學生對於學習與校園生活真實紀錄之素材與途徑，特別是學生在之當下遭遇與紀錄，包含學習的心得、變化與進步，以及學生所記錄的學校生活等。除了對於學術研究者，能夠藉由這批史料，開展對於 1930 至 1950 年代之間近代教育施行於地方與個人的真實經驗之研究外，對博物館所面對的一般群眾而言，在觀看文物的同時，可以藉由一個人的求學故事，更易於拉近與理解相關的記憶脈絡與歷史知識。

關於本文此次針對學習筆記，僅以其中兩個面相進行初步整理資料與提出觀察方向。後續研究之開展，可進一步將這批學習紀錄的內容進行爬梳，與官方教育制度內容對照，以及更進一步藉由現今前人先進對於近代教育史研究成果，更進一步聚焦問題意識、分析與論證，更能透過這批來自地方民間與類型數量龐大之歷史材料，藉由解讀其中具體且存在於真實的「人、事、物」，更深入的探討 1930 年代至 1950 年代臺灣學校教育的發展下「人、學校、地方、國家」四者之間的關係，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候戰後初期近代教育具體運作的樣貌。